

# 生态人类学发展述评\*

冯雪红 张文文

生态人类学是人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注重对人类、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基于中西比较的视野,本文对生态人类学学科的基本问题和学术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和评述。中西方生态人类学研究具有共同性:研究方法的运用和完善基本一致;重视传统生态知识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共同关注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此外,由于研究对象与所处世界关系的变化,也使中西方生态人类学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在学科发轫时期,理论与现实观照不同;对比学科研究范式,回应与发展转向不同;追溯学术思想渊源,探索与应用倾向不同。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处于重要时期,中国生态人类学研究前景广阔。

关键词:生态人类学 文化适应 全球生态危机

作者冯雪红,女,《北方民族大学学报》编辑部教授;张文文,女,北方民族大学民族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地址:银川市,邮编 750021。

当前,全球环境变迁加剧,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在中国,“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及“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提出,进一步促进了人类与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研究的深入。至今,研究人类与生态环境关系的学科有社会生态学(social ecology)、人类生态学(human ecology)、文化生态学(cultural ecology)、生态人类学(ecological anthropology)等。自1968年美国人类学家韦达(Andrew P. Vayda)和拉帕波特(Roy A. Rappaport)首次提出“生态人类学”以来,经过50多年的发展,生态人类学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本文从中西比较的视野出发,尝试对生态人类学的概念界定与研究对象、西方生态人类学聚焦问题的发展、中国生态人类学的学术实践进行梳理和评析,揭示中西方生态人类学的共同性和差异性,并对中国生态人类学的发展趋向进行分析探讨,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生态人类学学科体系提供理论参考。

## 一、生态人类学的概念界定与研究对象

20世纪50年代以前,已经有学者开始探讨文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并根据环境决定论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代甘宁青地区生态文明建设与筑牢生态屏障路径研究”(项目编号:19BMZ149)和北方民族大学学术领军人才资助项目“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西北地区多元化乡村治理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019BGLS02)的阶段性成果。

(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环境可能论(environmental possibilism)等相关理论加以阐释, 这为生态人类学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渊源。20世纪50年代中期, 斯图尔德(J. H. Steward)“文化生态学”的提出, 对之后生态人类学的理论方法、研究取向有重要启示, 对学科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肇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的民族生态学(ethnoecology), 注重主体视角, 强调从地方群体的认知视角探讨人类对其环境知识和环境过程如何进行组织和分类, 研究路径明显不同于生态人类学的其他流派, 典型范例即康克林(Harold Conklin)关于哈努诺人动植物认知与分类的研究。20世纪60—70年代, 是生态人类学迅速发展时期,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功能主义——以美国人类学家拉帕波特、韦达“系统论”和哈里斯(Marvin Harris)“文化唯物主义”为代表的两种理论流派在该学科研究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与前辈学者多注重探讨人群、文化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不同, 新功能主义学者将人群视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 致力于揭示人群与生态系统中其他部分的功能关系。20世纪70—80年代, 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与生态危机的内在关联, 生态人类学逐渐衍生出过程生态人类学(processual ecological anthropology)、政治生态学(political ecology)等分支学科。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 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峻, 生态人类学向环境人类学迈进, 环境人类学(environmental anthropology)通过多学科、跨学科的调查研究重构人类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主张在“一体化的世界之中”研究人与环境的关系, 这是学科发展中对生态人类学研究范式转变的重要补充和拓展。生态人类学的发展历程, 清晰地折射出国内外学界对生态人类学概念与研究对象的不断探索。

#### (一) 生态人类学的概念界定

何为生态人类学? 国外学界有不同的定义和认知。美国人类学家奥尔诺夫(Benjamin S. Orlove)的定义为:“生态人类学是人类生存环境与人口动态、社会组织、人类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 它既包括对特定人群进行比较研究, 也从共时和历时的角度对特定人群进行分析。在许多情况下, 生产体系建构了人口动态、社会组织、文化与环境之间的重要联系。”<sup>①</sup>有学者则认为, 生态人类学不只是关注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还探讨将“环境”用于人类学解释的各种途径。<sup>②</sup>英国肯特大学的艾伦(Roy Ellen)侧重从生态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进行定义:“生态人类学是用系统方法以及生物生态学的概念和方法仪器来理解人类与环境的关系, 其关键概念包括生态系统、反馈、文化适应、能量和营养流, 并且与承载能力、时间预算及能量输入和输出测量等定量方法相关联。”<sup>③</sup>生态人类学概念内涵不断扩充, 在强调基础性研究的同时, 越来越重视应用性研究, 以期在全球生态治理中发出更多的声音、发挥更大的作用。

早在中国古代, 就有学者论及生态, 其中“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尊重生命”即是核心思想。在人类学、民族学传入中国后, 一些学者或多或少涉及生态研究, 费孝通、张之毅的《禄村农田》对禄村灌溉农业模式进行了系统研究, 被美国人类学家哈里斯视作中国生态人类学研究的范例。<sup>④</sup>20世纪50年代受苏联民族学的影响, 中央民族访问团运用“经济文化类型”理论进行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和民族识别, 在调查中涉及对生态层面的关注, 主张从静态和动态、历

① Benjamin S. Orlove,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 9, 1980.

② [美]唐纳德·L·哈迪斯蒂著, 郭凡、邹和译:《生态人类学》, 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 第1页。

③ Roy Ellen,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in H. Callan ed.,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Anthropology*,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2018,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9781118924396.wbiea2127>, p. 1.

④ 祁进玉:《生态人类学研究:中国经验30年(1978—2008)》, 《广西民族研究》2009年第1期。

时性和共时性等方面探讨地理环境、生计方式与文化的关联,这为中国生态人类学的萌发奠定了基础。<sup>①</sup>当代学者普遍认为生态人类学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传入中国的,结合中国的文化背景和生态环境,衍生出本土化的生态人类学理论。因翻译倾向及学者见解的差异,关涉生态人类学,学界有文化生态学、人类生态学、生态人类学、民族生态学、生态民族学、生境民族学等不同称谓。宋蜀华认为,生态人类学着重研究人类群体与周围环境间的关系,它把人类社会的文化视为特定环境条件下适应和改造环境的产物,并且强调生态人类学研究可以是历时性的(diachronic),也可以是共时性的(synchronic)。<sup>②</sup>杨庭硕认为,“生态人类学研究的实质是剖析人类社会与地球生命体系这两大自为体系之间的互动运行关系”,<sup>③</sup>可将其称为“二元制衡论”。在尹绍亭看来,生态人类学以文化适应为研究对象,并借鉴应用生态系统的概念来考察文化、环境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功能,发掘和整理作为人类适应的知识和行为体系,从而最大限度地进行生态学角度的文化及其演化的阐释。<sup>④</sup>李霞强调生态人类学是“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人类、生态环境及文化之间关系的学科”。<sup>⑤</sup>可以看出,中国学者对生态人类学的概念界定更注重文化适应、人与环境互动等方面的相互影响,由此使生态人类学研究更具人文性,而非凸显生态学特性,体现了中国生态人类学的学科性质和理论特点。

对生态人类学的概念界定,中西学者没有太大的争议。随着社会变迁,相应的环境变迁以及研究主题、研究任务、研究范式的发展变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等要素都被纳入分析框架,主要研究人类、文化与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中国生态人类学吸收了西方相关理论方法,结合我国各地区实际的生态环境问题,建立起系统的生态人类学学科体系,并逐渐凸显出中国学术话语的特色。在后续研究中,生态人类学还涉及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等理论,增添了新的研究议题,其学科性质更具应用性,充分展现了这一学科的生命力和活力。

## (二)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对象

早期的生态人类学家主要关注生物进化、能量转换、营养转化、资源分配等议题。随着研究议题的拓展,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不断丰富和多元。美国罗格斯大学的韦达(Andrew P. Vayda)和麦凯(Bonnie L. McCay)曾对20世纪50年代生态人类学研究进行批判。他们认为,这一时期的生态人类学研究过分强调能量研究,无法解释文化现象,专注静态平衡研究,对分析单位缺乏清晰的认识等。之后,他们对生态人类学关注的新内容提出要求:其一,除了关注那些与能源利用有关的问题之外,同时也应该尽可能多地关注环境危害或问题;其二,关注调查环境危害的特征,如危害程度、持续时间等,与人们应对危害的时间及其他属性之间的可能关系;其三,放弃以平衡为中心的观点,转而寻求与内稳态相关的变化;其四,研究群体和个人是如何应对风险的。<sup>⑥</sup>20世纪60年代的生态人类学,以其功能主义、系统论以及聚焦负反馈

① 王延中主编:《新中国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7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95—197页。

② 宋蜀华:《人类学研究与中国民族生态环境和传统文化的关系》,《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

③ 杨庭硕等:《生态人类学导论》,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

④ 尹绍亭:《人类学生态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编:《中国民族学纵横》,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119页。

⑤ 李霞:《文化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生态人类学》,《民族研究》2000年第5期。

⑥ Andrew P. Vayda and Bonnie J. McCay, “New Directions in Ecology and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 4, 1975.

而闻名,人类学家对文化习俗及宗教信仰在人类优化环境适应和维持未退化的地方区域生态系统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研究。<sup>①</sup>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朗(Paula Brown)则关注整个民族的社会生态系统,其目的是研究更大系统中社会、文化与环境之间的关系。<sup>②</sup>20世纪90年代以来,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环保运动等话题引起了学界的关注,随之这些话题也成为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奠定了生态人类学的学科定位,提升了学科的学术影响力。

在关注西方生态人类学研究对象的同时,根据我国生态环境现状以及生态人类学研究的进展,国内学者逐渐总结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对象。尹绍亭陈述了生态人类学关注的主要层面:技术层面核心是食物等物质资料的生产和获取;制度层面具有管理和保护物质生产资料及协调社会关系的功能;精神层面具有文化适应的重要内涵。<sup>③</sup>这些层面体现了人类适应生态环境和顺应自然规律,以及人类对环境改造的能动性。袁鼎生认为,整体生态场是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与核心范畴,而整体生态场是“人的生态活动与自然的生态活动贯通为一构成的”。<sup>④</sup>谭卫华等认为,生态人类学研究范畴包括各民族生境中生命物质和物质能量的转化形式及规模。<sup>⑤</sup>杨庭硕等立足时空维度,认为探究生态环境稳定运行的超大尺度观是其研究对象。<sup>⑥</sup>这些学者跳出常规范畴,从不同维度解析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以此扩大该学科的研究范围。中国进入生态文明建设新时代,生态人类学有了新的研究对象,近期生态人类学的主要研究议题有:地方性知识与生态人类学的关系;民族地区的生计、生境与文化、环境变迁;生态移民和生态补偿问题;生态文明与制度建设的关系。<sup>⑦</sup>此外,有些学者还持续关注生态博物馆、文化生态村、传统生态知识、“生境—生计—生命”等议题。

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生态环境问题,中西学者对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也随之发生变化,从最开始偏向能量转换、文化适应、生态系统,到涉及传统生态知识的价值和作用,这是一个不断进行实践和反思的过程。进入生态文明新时代,学者越来越主动参与到全球重要的公共议题之中,生态灾变与生态恢复、气候变化与自然灾害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都是备受关注的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这促使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更具全球性、时代性和地域性。不断发现新对象、拓宽新领域和扩展新视角,是生态人类学未来发展的一种趋势。

## 二、西方生态人类学的发展脉络

生态人类学的新近发展,对生态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和研究取向提出了新的要求。从发展态势来看,西方生态人类学主要关注文化适应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生态系统对环境的影响、传统生态知识的作用等;跟随全球化发展趋势,还关注最新的生态环境问题。总体来看,西方生态人类学已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① Conrad P. Kottak, "The New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 101, No. 1, 1999.

② Paula Brown, "New Guinea: Ecology, Society, and Culture,"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 7, 1978.

③ 尹绍亭:《关注生态人类学,重视文化适应研究》,《景观设计学》2018年第3期。

④ 袁鼎生:《生态人类学的整体对象》,《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⑤ 谭卫华、游俊:《生态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与资料分析》,《鄱阳湖学刊》2009年第2期。

⑥ 谢景连、杨庭硕、罗小芳:《浅析生态人类学的理论预设与实践》,《怀化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

⑦ 张玉林:《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研究:八个学科纵览——2017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环境论坛综述》,《南京工业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

### (一)对人类与生态环境关系的探讨

20世纪50年代以来,公众逐渐认识到消费经济带来了一个无法避免的后果——环境污染,商品的生产和消费生成废弃物,而废弃物又反过来污染空气、水和土地,这对人类和生态环境带来不利影响。当时,美国、英国发生的空气污染事件改变了人们对人类与生态环境关系的态度。<sup>①</sup> 学界对文化与生态环境关系的探讨备受关注。由于人类适应环境的主要机制是文化,一些学者开始关注文化如何适应环境、文化适应的动态变化。1955年,斯图尔德提出“文化核心”(cultural core)概念,并认为“文化不仅反映人类在适应、调节和求生存方面的遗传潜势,更表明了人类社会的本质”。<sup>②</sup>作为文化唯物主义的倡导者,哈里斯极其欣赏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在哈里斯看来,“文化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是人类适应环境的主要机制”,<sup>③</sup>其经典案例就是对“印度圣牛”的文化分析。1963年,美国人类学家格尔兹(Clifford Geertz)从文化生态学角度阐释了印度尼西亚爪哇的农业类型,认为应当“关注文化中那些与生态和经济最密切的部分”。<sup>④</sup> 同年,美国埃默里大学亚内尔(Richard A. Yarnell)在调查美国印第安人种植橡胶树林时发现,文化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是动态变化的,而文化对环境变化的适应,其结果是进一步改变环境,因而造成了额外的相互调整,这将一直持续到相对稳定的状态。<sup>⑤</sup> 文化在生态环境中有何作用? 对此,美国密歇根大学科塔克(Conrad P. Kottak)等运用联系法(linkages methodology)把地方的变化与区域、国家及世界系统的变化联系起来,并强调将地区的文化置于更大的系统内进行研究。<sup>⑥</sup> 进入21世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萨顿(Mark Q. Sutton)等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指出,研究文化与环境的关系旨在了解文化适应的范围,并为当代许多重要问题,如森林砍伐、物种灭绝、食物短缺和气候变化等,尝试提供解决方案。<sup>⑦</sup> 西方学者长期关注文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认为二者相互制约并相互依存,这是生态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发现。

### (二)对种群与生态环境功能性关系的解释

20世纪60—70年代,公众对环境退化的担忧日益加剧,因解决环境问题而进行的生态学研究资助——如国际生物学计划(International Biological Programme)——的大幅增加,系统生态学家宣称生态学理论和方法特别适宜解决即将到来的“环境危机”。<sup>⑧</sup> 受“新进化论”(neo evolutionism)和“新功能主义”(neo functionalism)影响,一些学者不再满足于探讨文化的作用而开始转向理解生物群落内部的关系。基于“生态系统”概念,他们将种群(population)作为分析单位,揭示种群与生态系统中其他部分的功能关系,并对能量流动以及其他环境因素进行定量分析,这被誉为连接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一种方式。1962年,美国生态学家卡森

① Gordon J. MacDonald, "Environment: Evolution of a Concept," *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 & Development*, Vol. 12, No. 2, 2003.

② 参见[美]唐纳德·L·哈迪斯蒂著,郭凡、邹和译:《生态人类学》,第8页。

③ 参见王晴锋:《印度圣牛观解析——基于宗教、历史、理性选择与文化唯物主义》,《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

④ 参见李红阳:《文化人类学的诠释学转向述论——以〈农业内卷化〉为中心》,《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

⑤ Richard A. Yarnell, "Reciprocity in Cultural Ecology," *Economic Botany*, Vol. 17, No. 4, 1963.

⑥ Conrad P. Kottak, "The New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 101, No. 1, 1999.

⑦ Mark Q. Sutton and E. N. Anderson, "Cultural Ecology," in H. Callan ed.,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Anthropology*,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9781118924396.wbiea1452>, p. 1.

⑧ Paolo Palladino, "Defining Ecology: Ecological Theories, Mathematical Models, and Applied Biology in the 1960s and 1970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Biology*, Vol. 24, No. 2, 1991.

(Rachael Carson)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揭示了过度使用杀虫剂等化学药品对环境的污染及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同时掀起了多学科对生态环境问题理论的反思。拉帕波特运用生态系统、自我调节等重要概念展开了对新几内亚高地战争与仪式的研究。在《献给祖先的猪》这部享誉生态人类学界的专著中,他尤其关注生态系统中“生态意义上的种群”,而这里的“生态系统”是指不同种群或生物体与非生命物质之间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的系统。在新几内亚地区,僧巴伽人与马林人的战争和仪式具有调节功能,凯阔(kaiko)仪式中祭祀祖先所杀的猪,不仅维持了其领土内生态系统的平衡,还具有控制战争发生的频率、提供优质蛋白质以及确保当地猪肉供应等功能。<sup>①</sup>拉帕波特在新几内亚地区的研究表明,以下两方面在今后研究中应着重考虑:一是深入理解生态系统的定性方面、变化过程和认知模型等;二是严谨调查生态关系中可量化的物质方面。<sup>②</sup>充分认识生态系统是如何运作的,需要厘清系统内的物质如何交换以达到平衡。英国牛津大学里瓦尔(Laura Rival)对生物及生态系统进行了历时性分析,以期更充分地解释其结构和功能特性。<sup>③</sup>英国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的米尔顿(Kay Milton)认为,过去生态人类学倾向于将人类文化(共同信仰、价值观、规范、制度体系)和人类社会(由共同文化特征结合起来的人群)作为主要分析单位,而生态系统方法使研究转向关注种群,这正是影响环境条件并受其实质性影响的单位。<sup>④</sup>

总之,生态人类学家将生态系统中的种群、生物和非生物看成一个整体,认为三者相互作用、互有影响。这一时期,生态人类学先重点关注能量流动,后侧重对种群与自然耦合系统的研究,不断推动学科的整体性发展。

### (三)对传统生态知识的研究

20世纪60—70年代,跨学科的民族生态学成为生态人类学发展历程中的另一主线,其研究领域主要围绕非西方社会如何与自然共处、传统生态知识在现代社会的命运等议题,这激发了一部分学者对生态问题的兴趣。生态人类学家尝试从认知视角阐释人类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运用原住民观念及语言类别构建所描述的生物和文化环境。<sup>⑤</sup>

自此,传统生态知识(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 TEK)进入生态人类学家视野。这种知识体系有别于西方现代科学知识。传统生态知识是一个累积、动态过程,建立在集体智慧、实践经验和适应变化之上,在对社区进行生态修复时,原住民可以分享其拥有的大量传统生态知识。而传统生态知识与现代科学知识的整合,也可为人类与地球互动提供更多的稳定性和平衡性。<sup>⑥</sup>美国佐治亚大学布罗修斯(Peter J. Brosius)等人建议,以生态为导向的民族志学者应该将来自文化和生物生态学的传统技术与来自语言学的技术相结合,这些技术被认为

① Roy A. Rappaport, "Ritual Regulation of Environmental Relations among a New Guinea People," *Ethnology*, Vol. 6, No. 1, 1967; Aletta Biersack, "Introduction: From the 'New Ecology' to the New Ecologie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 101, No. 1, 1999.

② Lisa L. Gezon, "Of Shrimps and Spirit Possession: Toward a Political Ecology of Resource Management in Northern Madagascar,"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 101, No. 1, 1999.

③ Laura Rival, "Amazonian Historical Ecologies,"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Vol. 12, 2006.

④ Kay Milton, "Ecologies: Anthropology, Culture and the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Vol. 49, No. 154, 1997.

⑤ Linda M. Whiteford, "The Ethnoecology of Dengue Fever," *Medical Anthropology Quarterly*, Vol. 11, No. 2, 1997.

⑥ Keith Bowers, "Learning from 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Vol. 23, No. 3, 2005.

更适合探索本土环境概念。<sup>①</sup>同时,民族志学者也应当像理解自己文化那样理解原住民传统生态知识对环境的作用。在《民族生态学:情境知识/定位生活》论文集中,洪恩(Eugene S. Hunn)撰文提及“第四世界社区”(fourth world communities)——拥有传统生态知识的社会,认为在这一世界社区中传统生态知识可为创造生物多样性、文化多样化及健康的未来世界提供可行选择,他还呼吁要大力研究和保护传统生态知识。<sup>②</sup>梅勒(Brien A. Meilleur)认为该论文集选用的案例充斥着来自北美、南美、非洲和亚洲地区人们的声音,涵盖了一系列生态问题,如自然资源保护、可持续发展、地方性知识与生物多样性的关系、公地在发展中的作用、环境管理的多样性和公平性等。<sup>③</sup>由于生态人类学家越来越认识到传统生态知识是了解环境变化以及管理和保护生态系统的有利工具,他们在此后的研究中聚焦了以下方面:记录逐渐消失的传统生态知识;了解生物和文化多样性的相应变化;评估导致传统生态知识流失的变化过程和驱动因素。<sup>④</sup>对于如何挖掘和保护非西方社会的传统生态知识,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彼得里洛(Michael A. Petriello)等运用文化共识分析调查(cultural consensus analysis)、民族志访谈(ethnographic interviews)和参与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三种方法对尼加拉瓜当地猎人的传统生态知识来源进行了三角测量。而文化共识分析是人类学家用来评估一个特定话题知识的共识程度或社会分布的一种理论和一套统计工具,可以将文化共识的程度概念化,并且平衡文化的一致性,<sup>⑤</sup>此外,还可采用实地考察(field trips)、问卷调查(questionnaire)、跨文化比较研究(cross-cultural survey)等方法获得定性资料,以期更好地发挥传统生态知识保护生态环境的作用。

随着对传统生态知识的深入研究,有学者特别关注地方性知识以及对生态上的“高贵野蛮人”之争论。巴西马拉尼昂联邦大学波西(Darrell A. Posey)等人就南美洲亚马逊地区社会及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提出运用原住民的地方性知识进行保护和研究。<sup>⑥</sup>美国佐治亚大学纳扎雷亚(Virginia D. Nazarea)探讨地方性知识和文化记忆对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指出随着原住民地方性知识及技术被详细记录和大力推广,他们的知识和技术也成为国际农业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的信息货币。<sup>⑦</sup>总之,研究地方性知识为理解人与生态环境关系、促进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效路径。生态上的“高贵野蛮人”则是基于地方性知识建构的,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哈姆斯(Raymond Hames)指出,围绕生态上的“高贵野蛮人”之争代表两种

① Peter J. Brosius, George W. Lovelace and Gerald G. Marten, "Ethnoecology: An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Knowledge," in G. G. Marten ed.,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in Southeast Asia: A Human Ecology Perspective*,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86, p. 188.

② Eugene S. Hunn, "The Value of Subsistence for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in V. D. Nazarea ed., *Ethnoecology: Situated Knowledge/Located Lives*,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99, pp. 23—36.

③ Brien A. Meilleur, "Ethnoecology; Situated Knowledge/Located Live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 104, No. 1, 2002.

④ Erik Gómez-Baggethun and Victoria Reyes-García, "Reinterpreting Change in 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 *Human Ecology*, Vol. 41, No. 4, 2013.

⑤ Michael A. Petriello and Amanda L. Stronza, "Hunting as a Source of Local and 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 among Campesinos in Nicaragua," *Human Ecology*, Vol. 49, 2021.

⑥ Darrell A. Posey, etc., "Ethnoecology as Applied Anthropology in Amazonian Development," *Human Organization*, Vol. 43, No. 2, 1984.

⑦ Virginia D. Nazarea, "Local Knowledge and Memory in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 35, 2006.

截然不同的研究路径:一是涉及原住民的保护问题,狭义地侧重于利用民族志、考古学、历史资料进行个案研究;二是在方向上更广泛、更人性化和政治化,从身份、生态知识、意识形态以及原住民和保护团体等层面将生态贵族作为一种政治工具,重新定义生态贵族这一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个争论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思考人类如何管理或构建他们的生态环境,以及他们所处生态环境如何影响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生物多样性。<sup>①</sup>

#### (四)对环境变迁中生态问题的全新关注

20世纪80年代至今,在全球资本主义背景下,人类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越来越复杂,再加上西方国家不负责任地将生态危机转嫁给第三世界国家,由第三世界国家的弱势群体承担环境恶果,如资源枯竭、环境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疫病肆虐等,严重威胁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因此,生态人类学开始转向研究全球化、现代化和世界政治对当地环境的影响,这一时期,生态人类学被称之为“新生态人类学”,其间生态人类学家还达成了一个共识,即人类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必定是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如前文所述,美国密歇根大学科塔克等就运用联系法开展研究。联系法的调查方法之一是长时间地研究一个地区,其目的是将地方层面上的变迁与地区、国家以及世界联系起来。对巴西工业化和商业化扩张的研究就是“联系法”应用的一个实例,重点讨论环境公害与风险意识。<sup>②</sup>

全球环境变迁本质就是一个政治经济问题,有学者从政治经济因素开展当代环境问题研究。美国斯坦福大学鲍尔(Andrew M. Bauer)从政治生态学视角构建权力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他把阶级、权力和所有权,即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影响的社会生产关系纳入与环境相关的唯物主义框架中,强调环境话语、知识生产、权力分散和“自然”表征。<sup>③</sup> 政治生态学提供了一种分析社会理论的框架,侧重于关注政治、经济、社会因素与环境健康问题的关系。在自然环境方面,美国地理学家沃克(Richard A. Walker)认为湿地管理和保护与政治经济背景和权力关系密不可分。<sup>④</sup> 英国东英吉利大学布莱基(Piers M. Blaikie)等在研究尼泊尔森林砍伐及土壤侵蚀案例中发现,探究全球政治经济布局如何成为塑造生态条件的结构性组成部分,需要在对环境变化的话语建构及争议进行分析之后来确定。<sup>⑤</sup> 其中,很多学科团队采用高新技术开展实地调查,美国华盛顿大学格林(Glen M. Green)等人利用卫星图像和植被图来确定马达加斯加东部雨林的分布范围,监测了35年间这片森林的砍伐率。<sup>⑥</sup> 然而,在采用高新技术进行研究时,应当注意不能过于依赖技术而忽视了人的作用。在疾病和健康方面,美国学者图尔申(Meredith Turshen)将非洲坦桑尼亚的人类疾病模式与殖民和后殖民时代的政治和经济关系直接联系起来。<sup>⑦</sup>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卡利佩尼(Ezekiel Kalipeni)等人举例介

① Raymond Hames, "The Ecologically Noble Savage Debate,"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 36, 2007.

② 杨玉珍:《新生态人类学的发展与应用》,《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Conrad P. Kottak, "The New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 101, No. 1, 1999.

③ Andrew M. Bauer, "Questioning a Posthumanist Political Ecology: Ontologies, Environmental Materialities, and the Political in Iron Age South India," *Archeological Papers of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Vol. 29, No. 1, 2018.

④ Richard A. Walker, "Wetlands Pre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on Chesapeake Bay: The Role of Science in Natural Resource Policy," *Coastal Zone Management Journal*, Vol. 1, No. 1, 1973.

⑤ Piers M. Blaikie and Harold C. Brookfield, *Land Degradation and Society*, London: Methuen, 1987, pp. 64-83.

⑥ Glen M. Green and Robert W. Sussman, "Deforestation History of the Eastern Rain Forests of Madagascar from Satellite Images," *Science*, Vol. 248, No. 4952, 1990.

⑦ Meredith Turshen, "The Political Ecology of Disease,"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Vol. 9, No. 1, 1977.



绍地方政治、经济因素与权力的关系是如何影响生态环境和引发流行疾病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非洲塞内加尔政府决定在塞内加尔河口修建迪亚马大坝来增加水稻产量,但建成后的大坝改变了上游水域生态。水域盐度降低、新建的灌溉渠道和开垦的稻田提供栖息地,促使血吸虫的中间宿主——淡水蜗牛——大量繁殖,而其天敌——本地甲壳类动物(虾)——几乎全部消失。大坝的修建产生了惨痛的生态后果——暴发了血吸虫病,这对人类健康产生了不利影响。<sup>①</sup>为阻止血吸虫病的蔓延,2013年塞内加尔政府制定一种生态无害化的干预策略,即利用乡村水产养殖业重新引入本地虾,以降低血吸虫繁衍和疾病传播的风险。

有学者关注城市政治生态层面,提供了城市生态问题研究的新思路。他们认为,为遏制城市边缘化和生态退化,制定城市政治生态的政治纲领至关重要。他们还强调,通过确定社会权力分配更公平的策略,以及确定环境生产模式更具包容性的策略,来增强社会环境建设的民主内涵,这有助于厘清经济、政治、社会与环境过程的关系。<sup>②</sup>英国牛津大学斯温格道(Erik Swyngedouw)等人探讨了城市化、可持续性以及城市水的生产与分配关系,重点研究在城市水系统的组织方式中所呈现的社会、经济、政治与环境过程之间的相互联系。<sup>③</sup>美国纽约大学拉德马赫(Anne Rademacher)则提出,城市政治生态的特点就在于关注组织资本、劳动力、信息和权力流动等多维度概念和物质系统,它没有将科学看作一种非历史化和静态的认知方式,而是向民族志学家展示动态的社会自然过程,在这些过程中,人类和非人类的生物物理变化可以被观察、评估以及问题化。<sup>④</sup>

有学者讨论全球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回应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马库斯·巴伯(Marcus Barber)在评介《全球变暖与健康的政治生态:新兴危机和系统性解决方案》一书时谈道,全球变暖主要是资本主义过度消费的后果,只有彻底转变从地方到全球的生产、消费和治理模式,才能真正缓解全球变暖带来的消极影响。<sup>⑤</sup>生态人类学研究的动力还源于对生态危机的批判性思考,这些危机不仅来自生态环境,还受干旱、洪水、荒漠化和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的影响。<sup>⑥</sup>英国斯特灵大学霍夫曼(Clemens Hoffmann)提及,中东地区正经历着战争冲突、石油危机,还受干旱等极端气候影响,气候难民(climate refugees)由此产生。<sup>⑦</sup>当前,持续关注全球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已成为学界重要议题。

如今,人类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地质时代——人类纪(Anthropocene),即人类行为对地球有着不可逆转影响的时代。生态人类学家开始关注一些新兴议题,如环保主义、生态女性主义、

① Ezekiel Kalipeni, Jayati Ghosh and Joseph Oppong, "Disease and Illness, Political Ecology of," in R. A. Marston 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Geography: People, the Earth, Environment and Technology*,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2017,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9781118786352.wbieg0540>, p. 5.

② Erik Swyngedouw and Nikolas C. Heynen, "Urban Political Ecology,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Scale," *Antipode*, Vol. 35, No. 5, 2003.

③ Erik Swyngedouw, Maria Kařka and Esteban Castro, "Urban Water: A Political-Ecology Perspective," *Built Environment (1978-)*, Vol. 28, No. 2, 2002.

④ Anne Rademacher, "Urban Political Ecolog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 44, 2015.

⑤ Marcus Barber, "Global Warming and the Political Ecology of Health: Emerging Crises and Systemic Solutions,"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Vol. 21, No. 3, 2010.

⑥ Ben Campbell, "Political Ecology," in H. Callan ed.,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Anthropology*,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9781118924396.wbiea2315>, p. 1.

⑦ Clemens Hoffmann, "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 as Orientalism: The Geo-Political Ecology of Crisis in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Vol. 31, No. 1, 2018.

社会运动等。新环境、新问题的出现总是会孕育出新的环保主义,正如美国耶鲁大学科特西(Luisa Cortesi)等人所说,环保主义不仅是一场政治运动,还是文化生产的丰富场所,它调解着大众对自然的理解、塑造公民关于健康的话语、培养人类对环境的反应。<sup>①</sup>关于性别与生态的关系,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德鲁(Georgina Drew)站在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介绍了印度阿坎德邦的加瓦里妇女参与反对修建巴吉拉提河—恒河(the Bhagirathi Ganga)大坝的环保运动。受印度历史、社会文化、宗教信仰和经济因素影响,加瓦里女性和男性反对建造大坝参与程度的差异性,证实了性别差异确实影响男女对生态环境的关注程度以及为保护自然而采取的不同途径和行为。<sup>②</sup>洛克耶(Joshua Lockyer)和维特托(James R. Veteto)在《参与生态乌托邦的环境人类学》论集中详细介绍了生物区域主义、永续农业和生态村三个相互关联的社会运动,还与人类学理论联系起来,提出这三项社会运动都是“将对正义和可持续性的道德关注放在首位,并试图与生物文化多样性、权力不平等和结构性暴力的复杂性作斗争”。<sup>③</sup>此外,在本体论转向(ontological turn)理论中,人类与非人类的生态关系也引起学者的注意,当代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拉图尔(Bruno Latour)摒弃人类中心主义,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阐释政治生态观,并且就生态问题建立人类与非人类共存的集体机制。<sup>④</sup>

当前,与生态人类学相关的学科,如气候人类学(climate anthropology)、灾害人类学(disaster anthropology)、符号生态学(semiotic ecology)、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交叉生态学(intersectional ecologies)、马克思主义生态学(Marxist ecology)、感知生态学(sentient ecology)等不断出现。在最新调查研究中,不仅沿用了人类学的方法,还借鉴生态学、地质学、历史学等学科的方法,进行多学科、多层次、多维度的理论和实践研究,采用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遥感技术(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人口数据分析(demographic data analysis)、消费日志(consumption log)、环境影响评价(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等方法,全面收集数据和资料,进行科学的数据分析和跨时空的比较,更加科学有效地分析生态人类学研究的问题,展现出西方生态人类学所关注生态问题具有复杂多元且现实的特性。

### 三、中国生态人类学学术实践的演进轨迹

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万物平等,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20世纪50年代,我国为顺利开展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苏维埃学派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被学者引入和运用,发挥了在认识民族共同体所处生态环境关联问题上的作用。1958年,林耀华与切博克萨洛夫(Н. Н. Чебоксаров)联合完成了《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一文,可视为中国生态人类学研究的开端。改革开放后,人类学民族学学科重新焕发生机,在老一辈学者

<sup>①</sup> Luisa Cortesi, etc., “Environmental Anthropology,” in H. Callan ed.,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Anthropology*.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9781118924396.wbiea1758>, p. 11.

<sup>②</sup> Georgina Drew, “‘Our Bones are Made of Iron’: The Political Ecology of Garhwali Women’s Activism,”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Vol. 25, No. 3, 2014.

<sup>③</sup> Joshua Lockyer and James R. Veteto, *Environmental Anthropology Engaging Ecotopia: Bioregionalism, Permaculture, and Ecovillages*,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13, p. 6.

<sup>④</sup> 陈雪飞:《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国际视野:布鲁诺·拉图尔的政治生态观》,《理论与改革》2021年第5期。

的努力倡导下,西方生态人类学经典著作先后被译介到中国,<sup>①</sup>相关论文也被翻译且刊载于中国学术期刊。<sup>②</sup>对西方生态人类学的译介工作,推动了我国生态人类学的本土化发展。在吸收、运用西方生态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过程中,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国内学者深入开展本土研究,不断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其中,曾少聪、罗意《中国生态人类学的发展与反思》一文深入探讨了中国生态人类学70年的研究历程,并总结和提炼出四个阶段的理论及其特征,为我国学者进行生态人类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参考。<sup>③</sup>罗意《生态人类学理论与方法》是目前国内全面系统梳理和论述生态人类学理论方法的著作。<sup>④</sup>伴随着中国生态人类学的发展,中国学者的学术实践在不同区域相继展开。

### (一)对地方社会与生态环境关系的研究

中国幅员辽阔,地貌和气候复杂多样,在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影响下,造就了丰富多样的地方社会与生态环境关系研究。

20世纪80年代初,尹绍亭开始关注云南刀耕火种问题。作为国内生态人类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尹绍亭关于云南山地民族游耕农业的研究,对重新认识中国西南和东南亚地区的“刀耕火种”具有开创性贡献。他采用“纵横交错,点面结合,系统分析”的研究方法,<sup>⑤</sup>致力研究云南山地民族刀耕火种的生计方式,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意义。他在田野调查基础上完成问世的《一个充满争议的文化生态体系——云南刀耕火种研究》,被学界认为是中国生态人类学的奠基之作,在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90年代中期,尹绍亭提出建设“生态博物馆”和“民族文化生态村”的构想,这为乡村建设、地域和民族文化的保护、创造及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较早展现出中国生态人类学的学科应用价值。<sup>⑥</sup>2012年,由尹绍亭、何明主编的《生态人类学丛书》(知识产权出版社)陆续出版,<sup>⑦</sup>切实拓展了生态人类学研究的

① 陆续翻译出版的主要著作:[美]朱利安·史徒华著、张恭启译:《文化变迁的理论》,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9年版;[英]埃文思-普里查德著、褚建芳等译:《努尔人:对尼罗河畔一个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美]唐纳德·L·哈迪斯蒂著、郭凡·邹和译:《生态人类学》,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英]凯·米尔顿著、袁同凯、周建新译:《环境决定论与文化理论》,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美]朱利安·斯图尔德著、谭卫华、罗康隆译:《文化变迁论》,贵州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美]罗伊·A·拉帕波特著、赵玉燕译:《献给祖先的猪:新几内亚人生态中的仪式》,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

② 20世纪80—90年代翻译的西方生态人类学论文有:[美]J·H·斯图尔德著、王庆仁译:《文化生态学的概念和方法》,《民族译丛》1983年第6期;[苏]B·И·科兹洛夫著、殷剑平译:《民族生态学的主要问题》,《民族译丛》1984年第3期;[美]R·McC·内亭著、张雪慧译:《文化生态学与生态人类学》,《民族译丛》1985年第3期;[美]凯·米尔顿著、仕琦译:《多种生态学:人类学,文化与环境》,《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98年第4期等。

③ 曾少聪、罗意:《中国生态人类学的发展与反思》,《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

④ 罗意:《生态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

⑤ 尹绍亭、耿言虎:《生态人类学的本土开拓:刀耕火种研究三十年回眸——尹绍亭教授访谈录》,《鄱阳湖学刊》2016年第1期。

⑥ 尹绍亭、乌尼尔:《生态博物馆与民族文化生态村》,《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⑦ 参见李永祥《泥石流灾害的人类学研究——以云南省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8·14特大滑坡泥石流”为例》(2012年)、郑寒《自然·文化·权力——对漫湾大坝及大坝之争的人类学考察》(2012年)、赵文娟《仪式·消费·生态——云南新平傣族的个案研究》(2013年)、邹辉《植物的记忆与象征——一种理解哈尼族文化的视角》(2013年)、孟和乌力吉《沙地环境与游牧生态知识——人文视域中的内蒙古沙地环境问题》(2013年)、董学荣和吴瑛《滇池沧桑——千年环境史的视野》(2013年)、陈祥军《回归荒野——准噶尔盆地野马的生态人类学研究》(2014年)、崔明昆《民族生态学理论与方法》(2014年)、乌尼尔《与草原共存——哈日干图草原的生态人类学研究》(2014年)、徐晓光《清水江流域传统林业规则的生态人类学解读》(2014年)、崔海洋和李峰《侗族传统农耕文化与珠江流域水资源安全》(2015年)、尹仑《气候人类学》(2015年),等等。

新领域,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20世纪90年代,杨圣敏到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人类学社会学系进修,崔延虎到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系培训,使他们较早接触到生态人类学,他们对新疆地区干旱文化、绿洲文化的研究,拓展了中国生态人类学鲜有涉及的领域。杨圣敏阐释了新疆自然环境对塔吉克人社会组织的影响,而他们的血缘家族就是抵御恶劣自然环境和灾难的社会组织形式。<sup>①</sup>崔延虎在新疆干旱区进行绿洲生态研究,2006年,他提出“绿洲生态人类学”的构想,强调本土知识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价值。<sup>②</sup>陈祥军关注新疆阿尔泰山哈萨克族游牧文化,探讨本土知识演变过程与草原生态变迁的关系。<sup>③</sup>罗意阐释了吐尔洪盆地哈萨克族游牧社会转型与草原生态环境变迁的关系,他还将新疆绿洲传统农作制度视为绿洲社会地方性知识系统的一部分。<sup>④</sup>中国学者研究新疆干旱区和半干旱区人群、社会与绿洲的关系,为世界其他干旱区和半干旱区开展绿洲生态人类学研究提供了实践经验。

此外,一些学者围绕内蒙古地区自然环境、生计方式、生态文化等展开研究。麻国庆分析了内蒙古蒙古族传统文化、社会发展与草原生态的关系,<sup>⑤</sup>阿拉坦·宝力格对牧区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草原牧区城镇化主导的发展模式、干旱区域的水资源、游牧生计方式变迁等进行探讨,<sup>⑥</sup>色音、孟和乌力吉、敖仁其等学者从生态人类学视角考察内蒙古草原生态文化。曾少聪主编的《生态人类学丛书》,<sup>⑦</sup>黄龙光的《上善若水: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水文化生态人类学研究》,范长风的《从地方性知识到生态文明:青藏边缘文化与生态的人类学调查》等,是对我国福建沿海海岸带、长江流域、西南民族地区及青藏高原地区进行的田野调查之作,都有对人、文化与环境关系的呈现。

## (二)对传统生态知识的发掘、整理和研究

中国传统文化积淀了丰富的生态智慧,对传统生态知识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受到极大关注。杨庭硕在贵州喀斯特山区作了大量传统生态知识和技术调查,发掘了当地丰富的传统生态知识,在少数民族传统生态知识研究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在长达30多年的生态民族学研究历程中,以杨庭硕、罗康隆为核心的学科团队,首创“生境民族学”,提出“文化制衡理论”“终端验证法”“相际经营原理”等理论和方法,他们的研究成果为我国生态人类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例如,《民族、文化与生境》强调民族的自然生境、社会生境与民族的文化、生存和发展的关系;<sup>⑧</sup>《文化适应与文化制衡:基于人类文化生态的思考》梳理了文化互动、

① 杨圣敏:《环境与家族:塔吉克人文化的特点》,《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② 范明明、崔延虎:《生态文明建设与草原、绿洲的生态人类学研究漫谈——崔延虎教授访谈录(下)》,《三峡论坛(三峡文学·理论版)》2020年第3期。

③ 陈祥军:《阿尔泰山游牧者:生态环境与本土知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④ 罗意:《消逝的草原:一个草原社区的历史、社会与生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罗意:《重新发现绿洲传统农作制度——以新疆综合考察报告为中心》,《贵州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

⑤ 麻国庆:《草原生态与蒙古族的民间环境知识》,《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1年第1期;麻国庆、张亮:《进步与发展的当代表述:内蒙古阿拉善的草原生态与社会发展》,《开放时代》2012年第6期。

⑥ 王延中主编:《新中国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70年》,第204页。

⑦ 参见曾少聪主编的《生态人类学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陕锦风《青藏高原的草原生态与游牧文化:一个藏族牧业乡的个案研究》(2014年)、吴振南《海岸带资源开发与乡民社会变迁:以竹塔村为中心的生态人类学研究》(2014年)、袁理《堤垸与疫病:荆江流域水利的生态人类学研究》(2014年)、依利米古丽·阿不力孜《沙漠干旱地区的人类文化适应研究》(2015年)、罗意《消逝的草原:一个草原社区的历史、社会与生态》(2017年)等。

⑧ 杨庭硕、罗康隆、潘盛之:《民族、文化与生境》,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族际关系与文化制衡的关系；<sup>①</sup>《侗族生计的生态人类学研究》《生境民族学研究》(第一辑)等著作聚焦民族生境、生计与生命关系,侧重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生态知识的发掘和整理,尤其关注贵州麻山地区的石漠化问题、清水江流域的生态环境问题、侗族“稻鱼鸭”的生计体系等。在生态人类学田野调查中,既需要通过共时性研究收集有用资料,也需要历时性研究以进行纵向观察,发现总结规律。罗康隆根据十多年田野调查经验提出生态人类学参与观察的新方法——乡民日志与学者跟踪,即当研究者不在场时,调研地点发生的事情、经历的场景及历史记忆,指定当地人协助记录,<sup>②</sup>这是中国学者对生态人类学研究方法本土化尝试的重要标志。当前,我国正处于生态文明建设时期,为更好地应对新时代的生态问题,杨庭硕等人提出的“生境民族学”这一概念,对构建中国生态人类学的话语体系和理论流派具有重要意义。<sup>③</sup>

有学者尝试用生态学、植物学专业知识进行传统生态知识的跨学科研究。裴盛基强调,我国民族植物学研究需要重视少数民族传统经济植物,尤其关注少数民族对植物的分类、认知和利用。<sup>④</sup> 崔明昆不仅厘清了本土植物与逻辑思维二者的关系,还探究了“传统生态知识的科学阐释”,将生态学的“中度干扰理论”“最佳觅食理论”“生态系统概念”应用于生态人类学研究中。<sup>⑤</sup> 在此基础上,崔明昆总结归纳出“生态系统方法论”,它要求将人类及其环境看成一个整体,把生态系统中的人与其他组成部分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过程作为重要研究内容。<sup>⑥</sup> 薛达元则专注于少数民族传统知识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作用。<sup>⑦</sup> 近年来,不少学者运用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和方法,研究傣族稻作文化、鄂伦春族和佤族森林文化、藏族牛粪文化、苗族水文化中传统生态知识的功能和作用等。<sup>⑧</sup> 而如何发掘和利用传统生态知识可持续保护当地生态环境,如何延续传统生态知识的生命力,如何实现传统生态知识与现代科学知识的结合,这是未来仍需研究和思考的议题。

### (三)对现代化、全球化影响下生态环境保护的探索

进入生态文明新时代,中国生态人类学在借鉴、吸收西方生态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反思和回应了现代化、全球化影响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拓宽中国生态人类学的研究领域,积极应对衍生的新议题,为中国乃至世界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中国智慧。

有学者站在学科前沿,着力阐释生态文明的内涵和意义。2004年,以“人类生存与生态环境”为主题的中国人类学高级论坛发表了《生态宣言:走向生态文明》一文,“生态文明”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尹绍亭介绍了“生态文明”的三个文化内涵,即文化适应、文化多样性、和谐共

① 罗康隆:《文化适应与文化制衡:基于人类文化生态的思考》,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

② 罗康隆:《乡村日志与学者跟踪——以清水江流域人工营林业田野调查为例的考察》,《吉首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

③ 罗康隆、杨庭硕、吴合显:《从生态民族学到生境民族学的思考》,《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22年第1期。

④ 裴盛基:《民族植物学》,《科学》1985年第2期。

⑤ 翟淑平、崔明昆:《个人学术历程中的生态人类学思考——崔明昆教授访谈记》,《三峡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

⑥ 崔明昆:《生态人类学的系统论方法》,《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

⑦ 薛达元:《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的保护与展望》,《生物多样性》2019年第7期。

⑧ 参见郭家骥:《西双版纳傣族稻作文化的传统实践与持续发展——景洪市勐罕镇曼远村个案研究》,《民族研究》1997年第6期;麻国庆:《开发、国家政策与狩猎采集民社会的生态与生计——以中国东北大小兴安岭地区的鄂伦春族为例》,《学海》2007年第1期;周家瑜:《黄瓦森林崇拜的生态人类学解读》,《西南农业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皇甫睿:《藏北高原的“清道夫”——生态人类学视角下的西藏牛粪文化》,《广西民族研究》2021年第3期;冷光伟、霍晓丽:《实践与理念:湘西苗族水崇拜的生态人类学考察》,《贵州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

生,还结合西部生态环境和民族文化的特殊性,提出“构建西部生态文明圈”的设想。<sup>①</sup> 范可强调,生态文明在人类学的视野里应该考虑到三点:必须摆正人类与生态自然的关系;人类应该服务于生态环境;学习和了解、发掘生存性智慧,服务整个人类共同体。<sup>②</sup> 这些洞见为我国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有学者呼吁弥补生态人类学缺失,首倡加强海洋生态人类学研究。曾少聪多次强调中国生态人类学缺少海洋板块,他的《生态人类学视角下东南地区的海洋环境与沿海社会》一文描述了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海洋性特征及其与海洋环境的紧密关系。<sup>③</sup> 张先清阐释了澳门海洋知识体系、海域管理与生态保护、海洋文化遗产保护等,认为海洋人类学视角的引入,在助力海洋开发、海洋资源保护、人海关系等问题的良性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sup>④</sup> 对海洋生态人类学的持续关注和加强研究,将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经验。

有学者关注现实问题,重点聚焦生态移民议题。任国英曾对内蒙古生态移民与生态环境关系开展研究,指出“在当代中国做生态人类学研究,国家力量、现代化、市场经济是绕不开的话题”,目前又在关注后生态移民时代生态移民的生存状况;<sup>⑤</sup> 祁进玉认为,“生态移民是解决生态环境保护和农牧民脱贫致富之间矛盾的需要”,强调要不断推进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恢复。<sup>⑥</sup> 冯雪红对甘青牧区藏族生态移民展开田野调查,<sup>⑦</sup>发现移民的社会适应状况与生计方式转型、后续产业发展、社会关系重构、社区整合密切相关,这关系到生态移民工程的成效,也影响着区域人口与地方经济社会稳定和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sup>⑧</sup> 这些研究充实了草原地区生态人类学研究,而加强对牧区环境史、民族地区产业转型机理的研究,将有利于观察搬迁前后当地人群、社会与生态环境的互动关系。

有学者关注生态热点,尝试探索公共议题。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疫病防治、动物保护和垃圾处置,都是学界关注较多的话题。尹仑探讨了云南藏族对气候变化的认知与应对,通过田野调查了解了藏族对气候变化的本土认知,呈现出地方性知识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现象中的价值和作用;<sup>⑨</sup> 李永祥对泥石流、干旱等灾害进行人类学分析,指出通过有效利用少数民族的传统知识,可以实现防灾减灾目的;<sup>⑩</sup> 袁理从生态人类学视角审视了疫病传播的原因、适应性特征以及抗击疫情中人类种群之间的合作与互助关系;<sup>⑪</sup> 缪芸从当地藏族人视角出发,关注野生

① 崔璨、尹绍亭:《从刀耕火种到生态文明——对生态人类学家尹绍亭教授的访谈》,《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7年第4期。

② 范可:《人类学视野里的生存性智慧与生态文明》,《学术月刊》2020年第3期。

③ 曾少聪:《生态人类学视角下东南地区的海洋环境与沿海社会》,《云南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④ 张先清:《澳门的海洋研究——一个人类学视角》,《南国学术》2019年1期。

⑤ 张珊、任国英:《任国英教授访谈记》,《三峡论坛》(三峡文学·理论版)2020年第1期。

⑥ 祁进玉、陈晓璐:《三江源地区生态移民异地安置与适应》,《民族研究》2020年第4期。

⑦ 冯雪红:《三江源藏族生态移民三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冯雪红、安宇、王玉强:《玉树临风:藏族生态移民调查纪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冯雪红、安宇:《搬迁的游牧民:黄河首曲、隆务河、大夏河流域藏族移民实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

⑧ 冯雪红:《藏族生态移民的生计差异与社会适应——来自玉树查拉沟社区的田野考察》,《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

⑨ 尹仑:《藏族对气候变化的认知与应对——云南省德钦县果念行政村的考察》,《思想战线》2011年第4期。

⑩ 李永祥:《民族传统知识与防灾减灾——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中的防灾减灾功能探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10期。

⑪ 袁理:《环境、适应与文化:生态人类学视野下的疫病研究》,《贵州民族研究》2022年第2期。

动物保护及垃圾治理问题,探讨地方性知识的变通性。<sup>①</sup> 21世纪以来的全球生态危机引起不同科学家的共同关注,在新的全球生态危机时代,从生态人类学研究框架出发,对公共议题进行的探索和尝试,展现出当代学者积极思考和实践的能力。

此外,中央民族大学、云南大学、吉首大学、新疆师范大学等高校创建研究基地、培育研究团队,开设了生态人类学相关课程。《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鄱阳湖学刊》《三峡论坛》等学术期刊先后开设的相关栏目,<sup>②</sup>成为生态人类学最新研究成果的重要展示平台。总体来看,中国生态人类学研究范围日益广阔,学者们先后在不同区域开展的学术实践,对解决当代生态环境问题有重要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的启示,一定意义上可以为认识和解决我国乃至世界生态环境问题提供可行路径。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中国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将大有作为。

#### 四、结 论

纵观生态人类学学术史,从中西方生态人类学发展脉络及关注议题来看,二者有三点共同性:一是研究方法的运用和完善基本一致。从最初使用人类学理论与方法进行田野调查研究,到跨学科研究中多学科方法的借鉴和使用,再到高新技术的采用,中西学者逐渐探索出普遍适用的生态人类学研究方法。二是重视传统生态知识的发掘、整理和研究。传统生态知识具有较高的实用性、科学性、地方性,对研究人类适应性有重要意义。民间传统生态知识蕴含丰富生态思想,面对社会及其所处生态环境的变迁,一些中西学者认识到传统生态知识的价值,积极发掘、整理、记录地方性生态知识,在运用科学技术开发自然的过程中,他们关注传统生态知识与现代科学知识的结合,从传统生态文化中汲取营养。三是共同关注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中西学者积极进行跨国学术交流,及时掌握最新研究动态,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为全人类的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探寻人类社会与地球生命体系和谐演进的理论依据。

同时,中西方生态人类学也有明显的差异性:从学科发轫时期来看,理论与现实观照不同。20世纪50—60年代,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西方国家正遭受严重的环境污染,西方学者开始关注人类如何更好地适应生态环境,尤其是非西方社会种群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并运用文化生态学理论、系统论来加以阐释;而中国正处于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民族识别时期,国内学者担负着为此助力的学术使命,尝试采用“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划分少数民族社会发展阶段,一定程度上也涉及少数民族与生态环境关系的讨论,带有较强的应用性和发展关怀。从学科研究范式来看,回应与发展转向不同。20世纪70—90年代,西方社会生态危机日益加剧,为回应新进化论和新功能主义的不足,西方生态人类学衍生出政治生态学、环境人类学等分支学科,带有较强的批判性,其核心是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发的环境问题、生态危机的全球化影响;同一时期,我国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生态人类学经历了从引介国外译著到本土化发展的过程,国内学者侧重研究地方社会与生态环境关系,重视传统生态知识的发掘、整理和利用,为如何协调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提供思路。从学术思想渊源来看,探索与应用倾向不同。进入21世纪,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持续恶化,受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

<sup>①</sup> 缪芸:《地方性知识的变通性——青海三江源地区生态保护行为田野观察》,《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

<sup>②</sup> 如《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开设的“本土知识与生态建设”“生态民族学研究”、《鄱阳湖学刊》开设的“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明”“生态人文社会科学专题研究”、《三峡论坛》开设的“专家访谈”等栏目。

影响,西方学者超越“自然—文化”二元论,不仅重构人类与非人类存在物的生态关系,还积极参与到全球性生态环境议题中,使研究更具时代性和现实性;迈入生态文明新时代,中国学者致力反思和回应现代化、全球化影响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秉持生态文明理念,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乃至地球生命共同体提供中国智慧。

当前,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处于重要时期,中国生态人类学研究具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其一,加强中国生态人类学学科建设,切实构建基于本土经验的学科理论体系。应加强发掘和整理可能消逝的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中优秀的传统生态知识,理性认识传统生态知识的价值,关注生态文化的继承和创新,有效进行跨学科合作研究以及“本体论转向”的学术反思,更为系统、科学地理解和把握人类与环境关系,以此加强学科建设,努力构建基于本土经验的学科理论体系。其二,助力生态文明建设研究,推进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在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系统中,坚持“绿色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统筹考虑中国生态系统安全、生态功能区总体规划等,应聚焦构建生态安全屏障、构建生态廊道、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保障水资源安全、发展后扶贫时代生态产业,以及深入研究海洋生态文化,把生态文明理念融入新农村建设,需特别关注乡村振兴中乡村生态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研究。其三,持续关注全球生态安全,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当全球面临生态危机时,中国作为全球生态文明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应该为治理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中国智慧和方案。敏锐洞察不同生态环境的社区、不同生态区域乃至全球动态变化的生态环境问题,深入研究如何维护不同生态系统内的生物多样性,助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社会 and 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从而彰显生态人类学的学科价值。中国生态人类学探索一系列新议题,将为人类的文明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贡献。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建设美丽家园是人类的共同梦想。面对生态环境挑战,人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唯有携手合作,我们才能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海洋污染、生物保护等全球性环境问题,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只有并肩同行,才能让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全球生态文明之路行稳致远。”<sup>①</sup>

〔责任编辑 刘海涛〕

<sup>①</sup> 习近平:《共谋绿色生活,共建美丽家园——在二〇一九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4月29日。